

新宅千年

——从飞凤落田山到俞公岭、石岭头——



(培德堂乾隆时期“孝友家风”匾额)

培德堂五福临门

新宅,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,其实是一座老宅,叫培德堂。据村民介绍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培德堂除部分房间留给主人使用外,其他的都给当地的贫雇农了。老宅因年久失修,破损严重,十多年前我去考察时,门厅、旗杆、拴马桩、鹅卵石庭院和房子主体结构尚存,但东厢已经倒塌。所幸热心的俞武仁、俞春雷父子将这老宅各部分或购或租,又经过十多年的张罗,修旧如旧,使老宅重新焕发生机。

这老宅有多老,我心里是没有底的,其间虽然几次向文保部门反映,终因我对这建筑物的历史把握不准而没有结果。这次去探访,倒是有了新发现。培德堂大厅正中,高悬着一块匾,上书“孝友家风”。因为风化严重,从下方看,前几次都没看出其他信息,这一次承村民提醒,发现匾上还有其他题字,右边是:“敕授文林郎新昌县教谕加一级姚廷元。”左边是:“乾隆肆拾柒年杏月国学生俞学书立。”这样看来,其时长赶上美国立国的时

间了。据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二十九、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十三、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卷八等记载,姚廷元,字葆叔,湖州乌程人,乾隆四十二年举人,以正七品职级主持新昌县教育事业,此次为新宅俞氏培德堂题匾乃其职务范围以内的雅事。如此,则培德堂的落成,大致在乾隆四十七年前后。国学生俞学书其人则查无所获,从行辈上推断,学字辈为五峰俞氏三十六世,与龟溪俞氏在乾隆年间的行辈吻合,唯相关宗谱据称已毁,可惜了。

培德堂正门门楼上“五福临门”四字阳文,取义于《尚书·洪范》“五福”: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。五道门,一道门对应一种福,这在古建中倒也见过,但堂主俞春雷对“五福”的理解却让我颇感清奇:鹤寿松龄,金玉满堂,健康安宁,厚德载物,花好月圆。特别是“考终命”,享尽天年并得以善终,这确是人生的极高境界,将用于洞房花烛的“花好月圆”一词移用于此,可谓别有会心。

追远祠四把竹椅

培德堂大厅前,随意摆放着四把竹椅。椅背的正面,分明镌刻着“追远祠”三个阴文。追远祠,原址在现董村村新宅自然村,据现年82岁的俞武仁老先生介绍,1949年后成了董村乡政府的办公地点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,这座与董村村下董自然村门楼里并列的龟溪俞氏宗祠被推倒,在原址上建起了董村人民公社的办公用房。21世纪初,董村作为乡一级行政单位撤销后,村民租住其中。俞老先生带我去参观,现场给我划,哪里是旧时的祠堂入口,祠堂大门的样式如何考究。经检索,万历《新昌县志》(1579年刊刻)已有明确记载,该书卷二有云:“追远祠,在董村,俞氏建,祀先祖俞伯。”康熙《新昌县志》(1671年刊刻)卷十三“祠祀志”亦载:“追远祠,在董村,俞氏建,祀其祖伯。”该志卷一“村墟”载董村而不载新宅,盖因新宅紧挨着董村,故此“董村”即目前董村行政村的新宅自然村。至民国《新昌县志》(1919年刊),在卷六“俞氏祠”下又载:“追远祠,祀始祖伯,在县东董村新宅。”其时董村下辖新宅,故云。追远祠已经不复旧貌,但这几把竹椅分明是追远祠的旧物。

至于它们的时间,从明万历到清康熙,再后来是民国,1949年后,追远祠先后成为董村乡、董村人民公社驻地,大概率不会做几把竹椅,再在上面镌刻“追远祠”字样

的。俞老先生还向我详细讲解,旧时年节,总要将这几把椅子用红毯包裹起来,让族内老人端坐其上,接受晚辈礼拜。老先生一边指着椅子下方搁脚的地方,说这是搁过多少代先人的脚,才磨损成这个样子,一边请我落座感受一下。我虽然在行辈上比他老人家长一辈,可是,面对这么贵重的文物,怎敢造次?

当天是正月初一,正赶上培德堂主人给附近村民赠送麻糍。培德堂宾客盈门,有捣麻糍的,有分麻糍的,好不热闹。看着进进出出的村民,我几次向堂主建议,追远祠不再,但这几把竹椅是几百年追远祠仅存的旧物,得把它们好生保护起来。如果村民中还有同样珍贵的竹椅,也希望能得到善待。



(椅背上镌刻着“追远祠”的竹椅)

作者俞志慧,浙江新昌人,绍兴大学二级教授,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著有《国语汇校集注》《君子儒与诗教——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》《古语有之——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》等十余部著作。

从培德堂出来,俞老先生领我去村东头看传说中的“飞凤落田”,就是前面所说的始祖俞伯的墓冢。好巧,我先后在新昌的飞天蜈蚣、三泾门口和绍兴的谢家坞见过始祖俞的墓地就在村口,这是又一例。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农场,山坡上养着鸡鸭,种着蓝莓、樱桃、猕猴桃等各种水果,俞老先生和族内几个老人在亲自经营,这里水好,空气好,产品都是有机无公害的,我几次来借过光。俞老先生指着农场对面的山坡,说两面山坡分别像凤凰的翅膀,始祖俞的墓地就在凤凰的头部。其下则是水田,这水田并不平整,恰似游动的泥鳅。我唯唯应着,一下子没看分明,倒是环绕村落的龟溪,流水潺潺;水口山上的树林,郁郁葱葱,即使是这冬春之交,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勃勃生机。回头检索文献,发现还真有记载,所不同的是,万历和康熙《新昌县志》作“飞凤落田山”,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则作“飞雁落田山”。

始祖得山水之助的传说各地都有,且大同小异,这里的小异又似乎有不一样的意义:董村,顾名思义,是董氏人士聚居之地,但该村目前仅几户人家姓董,其余大都姓俞,这个情况在明中期已经存在了,成化《新昌县志》(1477年编纂)卷八“村墟”下记载:“董村,去县东六十里,仕族俞氏所居。有南湖庵,米芾书匾,尚存。”俞老先生介绍,董氏祖先本来卜



(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卷一:“石壁桥,县东七十里董村新宅。”无钉无铆,内侧为现代新建桥梁,建新桥的同时,给老桥也刷了水泥。)

我初识米芾(1051—1107),还是因为他在大佛寺题的“面壁”二字。从那位大书法家所在的北宋到今天,已过去了九百多年的光阴,与此相先后的史迹,董村有水晶矿遗址,其摩崖题记位于龟溪北岸崖壁,该题记凿于元大德三年(1299),由元代中书左丞、浙东道宣慰使哈刺刺主持镌刻,记载其



(道士盘天仙庵)

董村新宅一带最有旅游价值和开发潜力的,在我看来还是道士盘。

从新宅往东,驱车到一个地图上标着“长蛇”的地方,沿着山地越野车压出的崎岖山路上行,不一会就到了赛道的出发点。没曾想,一个偏僻的山村,有时尚的高档酒店山涧堂,还有同样时尚的极限运动场地,这得拜培德堂主人多年的精心谋划。

再往上,山道两边,远近山坡上,到处是巨石,呈明显的冰川漂砾状。石浪虽不如新昌万马渡、上虞覆卮山集中,也不如庐山三叠泉雄伟,但分布范围更广,规模也更大,有一定的

居董村,有一回去龟溪上游钓鱼,回程前,随手将钓竿插在水边泥地上,次年再去,发现那钓竿已经长成青青翠竹了,于是觉得这地方养人,遂将全家迁居过去。成化《新昌县志》卷三“山川”记载:“雪溪山,在县东一百里,二十八都。其地阴寒,冬多霜雪。”董氏迁居之地即此,其后董氏果然在雪溪落地生根,之后又发展到平山、小将、芹塘和奉化,这是后话。

董氏离开董村,但董村之名依然如故,正如旧(蔡)坞有吴氏而无袁氏,上下求有梁氏而无求氏,元(袁)杵有张氏而无袁氏,刘门坞有吴氏而无刘氏,里(吕)家溪有王氏而无吕氏,任家村有朱氏而无任氏。儒吞,南宋末因兵燹,居民徐氏迁居东山、石磁,之后潘氏填补了这个空白,但一直到康熙《新昌县志》仍然记作“徐吞”;黄婆亭,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成寻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中已是陈氏居住的村落,至今还叫黄婆亭。仅此一点,我真切感受到乡民的温厚和乡风的淳朴,而不是人走茶凉的世故与浇薄。

同样让我感受到暖意的是飞雁落田山麓的一条弹石路。行走在这条小径上,俞老先生介绍道,这条路是俞氏祖先出资铺设的,远近村民于是称其为俞公岭。同村一石姓人家起而效仿,在村的西边也修建了一条路,村民们称之为石岭头。于是,我饶有兴趣地请老先生带我去看看石

岭头。村里通了公路后,俞公岭渐渐废弃,目前只有残存的几小段了,而石岭头呢,现在还在使用,俞老先生和他的家族就是这石岭头的维护者,显得平整洁净。龟溪上,连着石岭头的一座小桥还是俞老先生与连襟徐叶丰、梁伟合力营造的。我开玩笑说,燕窠村古官道上有座石拱桥,建桥者丁天松,给桥取了个吉祥的名字,叫如意桥,远近村民念丁公的好,都叫它丁公桥。您这桥还没命名,不妨就称之为“连襟桥”。

我还特意问起:“这修桥铺路的石氏后人现在如何?”老先生朗声说:“也过得不错。”诚然,寿、富、康宁不是没来由的,毕竟,善良的心田才是最上等的福田。



(石岭头,整洁如新)

水晶矿、羊精塔

在大德二年奉旨自宁海樟林至新昌石厂山开采水晶矿的经历。题刻分左右两块,左块记述采得水晶11374斤,云“皆珍异奇绝者”;右块详载采矿过程及官员职衔,行楷阴刻。1989年,董村水晶矿摩崖题记入选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董村村还有一处比上面摩崖题记更早的历史遗迹:羊精塔,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卷十九“轶闻”详载其事:“羊精塔,在邑东石壁新宅村外。”石壁,在村边龟溪边,万历县志即云其与响鼓岩、鸢嘴、熊口等皆为该村名胜。石壁古桥亦因此得名。“俗传有羊精居此,当夜三更时,人过此岭,有老人坐岩上,语曰:‘二十彭彭,月亮上三更;有人上府落县,等我同行。’过者不应则已,如其应之,则老人遂至,引人迷途,终夜不得出,人颇苦之。”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吧。“有道

士精法术,用草绳牵至羊肆(店铺),语云:‘杀此羊,勿去草绳乃可。’屠者不信,去草绳而羊亡(逃走)矣,仍返山中为孽。道士乃筑塔以镇之,高六尺许,为八方形,面刻佛号,顶尖小,刻大宋咸淳乙丑孟秋山翁秀发建造。至今每岁正月初十日犹用《莲经》十二部以压之。”并称引自《沃洲小纪》。咸淳乙丑,时当公元1265年。建塔人秀发,民国县志载有黄秀发,登咸淳九年(1273)癸酉乡科进士,或即此公。该石塔几年前还矗立在古永昌庵背后的羊精岗上,后来主要构件被村民收走,目前山坡上仅见底盘,一块圆形的巨大毛石。为纪念这为民除害的善举,俞武仁老先生等在永昌庵旧址陈放着该塔的照片,并小心翼翼地用玻璃罩保护起来。多么希望能找到原物,以见证董村新宅古老的历史。

道士盘

科学研究价值。尤其是大量巨石存在冰川擦痕,天然平整的石面方便在上面刻凿,值得好好规划。

临近海拔600多米的顶峰,有一个“仙人洞”,不知何时起,因洞的便利有了一个天仙庵,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卷十七记载:“道士盘,县东七十五里,旁有天仙庵。”天仙庵对面山头上,立着一块硕大无朋的巨石,成了天仙洞的案山,天造地设,不禁令我想起乾隆前的案山。其形状,恰如古人头上盘绕的发髻,“道士盘”一名莫非由此而来?

曾多次听俞武仁老先生提过“道士盘”,说他们祖上有人曾躲进“仙人洞”,后来又成了将军。回头我在民国《新昌县志》卷十二还真看到了相关记载:“俞成,字成之,号渭滨,康熙初应募江南,以次升,授上元督粮守备,遇贼劫粮,即航海夺之。升都司检书。康熙十四年,平乱有功,诏封怀远将军。少年擅膂力,好自尊大,尝得罪,县役执之,初匿道士盘岩洞

中一日一夜,有鼠衔馐首食(伺)之,得不饥。心甚异之。又逃至吴中丞庙内,天大雨,雷电交下,忽闻瓦上声隆隆,堕二物,起视之,乃布巾一条、铜铤一管也。将军披其巾,提其铤,曰:‘此天赐宝也。’遂拜而受之。于是出外投军。凡临时,头戴布巾,手执铜铤,击人无中而死者。即以铤击之,巾巾在首,弹不得入。由行伍而千总,而都司,而将军。虽勇力所致,其藉此二物为多。年老乞归,渡钱塘江,风浪大作,舟几覆,将军曰:‘岂天欲收吾宝物耶?’取巾、铤投水中,浪即平,乃济。”这位怀远将军的事迹,未见可以交叉比对的资料,一个南京督粮守备怎么还干检书的文职?叙述者将“都司检(金)书”简化成“都司”则明显有误;“将军”之类的头衔,大抵也是后人不明品级附会所致。但从文章学角度看,该文绘声绘色,跌宕起伏,首尾完具,是方志人物行状的上品,或者也得龟溪、道士盘、仙人洞等山川之助乎?